



仰韶文化：孕育华夏文明核心基因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仰韶文化，因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它是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涉及我国多个省区，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它覆盖范围广，延续时间长。虽然时间久远，但我们仍能从考古学发现中，看见那个时代仰韶文化闪动的光芒。

考古学家说，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根主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海波说，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粟作农业模式，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

通过考古我们已经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

张海波介绍，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不简单。

研究表明，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当时的人类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发现狗的驯化，家猪早期驯化的

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张海波说，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的数量也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普遍有意识地利用豆类资源。

张海波指出，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着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

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仰韶人还普遍狩猎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张海波表示，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有“大房子”，有公共生活

说到仰韶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词——“大房子”。

对，你的理解没错，就是面积较大的房址。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西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

张海波介绍，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为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对对单个聚

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

“大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也令人好奇。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张海波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介绍了河南对灵宝成烟遗址的发掘情况。成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成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此外，还发现有土雕蚕茧形器、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织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魏兴涛表示，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这一切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进行的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李新伟说。

没有被新航路打败，却输在了太理智

——威尼斯衰落的启示(上)

大航海时代

◎小白村

据说，游客到了威尼斯无不怦然心动，离开时，无不怅然若失。那里街道、宅邸和桥梁纵横交错，无不让人联想到它的辉煌岁月。1521年，威尼斯正如日中天，就像是1900年的伦敦或2000年的纽约，主宰了世界经济最活跃地区的贸易和金融，招来了最出色的工匠和艺人。

今天的威尼斯早就跌落神坛，不再是世界中心，人们提起它，只能想到轻飘飘悠悠的贡多拉，而不是驰骋地中海的重型冲锋艇。1797年拿破仑灭掉威尼斯共和国时，它只剩下11条军舰。

千年海都为何衰落？常见的解释是，葡萄牙人开辟了绕过非洲的航线，让威尼斯无法继续垄断香料贸易。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被短暂干扰的香料买卖

1499年7月，威尼斯人听说葡萄牙的达·伽马船队已经到达了印度加尔各答，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投进了威尼斯的水泊。从罗马时代开始，东方的香料在欧洲一直是赚钱的货物，而威尼斯人是最成功的香料商人。即使不久前，土耳其人消灭了拜占庭帝国，改变了东地中海的局势，但威尼斯人仍然小心地把控着香料生意。但现在，葡萄牙人要来插一脚了。

有一种错误的意见说：由于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把持了东方航路，香料卖到了天价，葡萄牙和西班牙才去探索新航路。这是倒打一耙。

实际上，达·伽马去印度之前，欧洲的香料供应充足，价格不贵。倒是1500年，蛮横的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击毁了阿拉伯香料船，威胁印度王公只能卖货给他们，造成人心动荡，市价猛涨；威尼斯人那一年拿不到货，才断了香料生意。16世纪的头几年，威尼斯忧心忡忡，眼看着传统贸易被野蛮人搅黄了。

没想到，土耳其和波斯人强力介入印度洋，葡萄牙船只不得不在波斯海港吐出一部分香料，香料辗转流到威尼斯，生意又恢复了。慢慢地，葡萄牙人经营香料的国王所有制，斗不过威尼斯更理智的合伙分成制，威尼斯人又夺回了香料市场。到1584年，西班牙国王开辟了绕过非洲的航线，让威尼斯无法继续垄断香料贸易。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新航路只是暂时的干扰，威尼斯香料生意在16世纪还越做越大了；直到17世纪上半叶荷兰武力占领香料群岛，威尼斯的优势才终结。

旧生意黄了还有新生意

大航海时代一开始，威尼斯的确受到很大冲击，但很快转危为安。

威尼斯的东方染料生意倒了霉，因为在巴西发现了染料红木；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

种甘蔗榨的糖也不好卖了，因为葡萄牙人1470年在新发现的马德拉岛种上了甘蔗，糖价狂跌，后来巴西种甘蔗，更是让糖变得平平无奇。

但威尼斯人转而在塞浦路斯种起了棉花，销路很旺。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和平繁荣，威尼斯瞅准了不少新货品，比如棉花、丝绸、葡萄酒、葡萄干等，在中东和欧洲之间倒卖，获利颇丰。

威尼斯这个小国家，从人民到政府都十分理智和务实。16世纪，很多技术工人移居威尼斯，因为这里没有战祸，原料充足，市场广阔，政府还鼓励发展工业。

1565年，威尼斯的毛纺织品产量是半个世纪前的10倍；纺织工人的数量是从前的3倍，超过了造船业雇佣的木匠和油漆工；肥皂业也急剧发展；玻璃业更是冠绝全球，销路广阔。

总之，16世纪威尼斯不仅没衰退，反而进步飞速，经济繁荣，它绝不是新航路开辟的受害者。威尼斯共和国在欧洲舞台彻底沦为小角色是18世纪的事。

航海民族却对新大陆没兴趣

威尼斯曾经是世界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国家，14世纪和15世纪最好的海图都出自威尼斯，如果没有它的航海技术积淀(以及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没有哥伦布等人的伟业。

但是，威尼斯人一次都未尝试过跨越大洋的航行。他们认为，新航路毫无意义，经营好东方商路才是正经。

彩陶文化，诉说某种信仰与精神

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

在博物馆展示的仰韶彩陶上，你常能看到的图案，就是鸟和鱼。

鱼，有典型的，有变体的，还有简洁版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明志介绍，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以宽带、鱼、蛙、鸟、人、猴、猿、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他认为，彩陶上的人面形象，指的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即巫祝；鱼、鸟等动物，是联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马明志说，仰韶彩陶以人面、鱼、鸟、猿、猴、兽面纹等为主要题材，是网络巫祝和神祇的使者；在现代看来长得有些狰狞的形象，指的就是神祇。

张海波提醒，尽管庙底沟时期彩陶发达，但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

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

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波说。

比如1508年时，塞巴斯蒂亚诺·卡伯特向威尼斯政府提交了一份探险的计划，想探索去中国的最佳航线。他爸爸乔瓦尼·卡伯特曾代表英国发现了北美洲。儿子继承了爸爸的高超航海技术，作为威尼斯市民来找政府资助。政府却拒绝了，认为不切实际。

达·伽马让威尼斯人如坐针毡。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触动威尼斯人。这是因为达·伽马满载香料而归，哥伦布却没找到一粒胡椒。威尼斯人不在乎无利可图的新大陆。

威尼斯人曾把舰船偷偷转交给埃及人，让他们到印度洋去打葡萄牙；却未亲自去大西洋上走一走、看一看。

威尼斯人对殖民美洲也没兴趣。对比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写的游记，会发现西班牙人关心占有新土地，威尼斯人则不然。威尼斯的传统是占领重要港口，好让船只避风补给，不会深入内陆去征服土著。

西班牙人去美洲内陆打仗和移民，在威尼斯人看起来很不理智——花费巨资的航行和军事行动，既得不到胡椒，也没有其他实惠。

谁料到，西班牙人很快就从印加帝国掠夺到大量黄金。没过几年，他们又在南美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由此撬动了世界经济。这笔横财不属于理智的威尼斯人。

我们会发现，理智的威尼斯人欠缺了一种重要的气质，这也让他们在变化莫测的新时代无法走远。

网络文学

“疾驰”路上要以自律“导航”

玉渊杂谈

◎谷中凤

近日，《网络文学作家职业道德公约》发布，发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歌颂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号召。应该说，这既是网络文学界的自律之举，也是行业自觉和自信的表现，值得我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作为新兴的文学门类，我国网络文学发展时间虽然不长，却以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庞大的规模体量引起世人广泛关注。根据最近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网络文学作品多达2905.9万部，网络文学作者超2130万人；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249.8亿元，用户规模达到4.60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为757.75万人。由此可见，网络文学不但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实现了许多文学创作者、爱好者的“文学梦”，汇聚起磅礴的文学创新创造力量，重塑着中国文学的当代版图，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成果，也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开辟了新路径、新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能否以及如何继续繁荣发展，实为中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文学的繁荣景象之下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从创作状况看，网络文学质量良莠不齐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既有题材新颖、内涵深刻的优秀之作，也有胡编乱造、文辞粗鄙的低劣之作。有的作品假借玄幻之名大写封建迷信，有的作品拿言情当幌子塞入色情私货，有的作品在“穿越”的设定下肆意篡改历史，抹黑民族英雄，还有的作品则沉溺“耽美”“虐恋”等小众文化，满足于描写杯水风波，缺乏道德情怀和现实关

坏事变好事

我们都是“知识的错觉”的受益者

字里行间

◎王大鹏

爱因斯坦曾说，“我学得东西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我不知道的东西更多。”萧伯纳也说，“好书读得越多越让人感到无知。”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即便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就像卡尔·萨根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然而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我想知道，我就一定能够知道，毕竟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只需要我们动动手指而已，其实这仅仅是一种“知识的错觉”。

提到“知识的错觉”，就不得不说由《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撰文推荐的《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独立思考》。在这本书中，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赫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为什么思考，我们如何思考，我们的认知为何会出错等，并且结合理论与实践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当然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仍在探索之中，但至少这些暂时性的答案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让我们得以管中窥豹，明白“知识的错觉”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种错觉有利也有弊。

就拿手机来说，它如今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介质，甚至已经成为我们人体的一种延伸，而且我们都认为自己对手机了如指掌。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完全知晓手机是如何工作的，即便是那些从事手机研发和生产的专业人士。因为手机的生产是一项集体协作的事情，每个生产者都只是为它提供了某一个零件或者某一方面功能。“我们自以为知识更渊博了，但就个体层面而言，我们实际上越发达地无知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个体理性，而在于无与伦比的群体思考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知识的错觉”的受益者。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所以我们会倾向于认为“人之所思即吾之所思”，所以一旦需要便能“召之即来，

甚至突破常识底线、与公序良俗背道而驰。另外，网络文学理论评论与创作发展不均衡，大量新出现的网络文学现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研究和批评，这也制约着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进程。

作为天然带有较强技术属性的文学门类，网络文学的变化和互联网技术变革息息相关，也与文化产业资本的活动密不可分。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网络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平台、新样式不断涌现，这反过来又“倒逼”网络文学创作模式和手法的更新；而算法等技术的引入，深刻改变了网络文学的读写关系，在固化读者的口味、偏好的同时也给创作者制造了“茧房”桎梏，加剧了创作中的同质化甚至抄袭、洗稿等错误做法。另一方面，在资本与平台逐利目的的推动下，作家写手化、作品商品化、阅读消费化、文学奥文化、评价量化等趋势若隐若现，文学的属性逐渐淡化、流失，长此以往，网络文学或将陷入有“网络”无“文学”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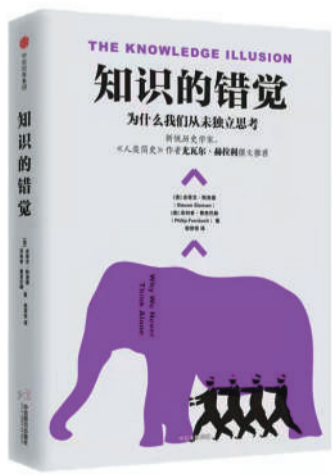
行业建设、行业管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如果把网络文学比作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那么，行业自律就是为其铺设的坚固路轨。推动网络文学繁荣发展，固然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但最关键、最根本的还在于提高网络文学行业建设的意识、能力和水平。这次《网络文学作家职业道德公约》的出台，无疑是增强行业自律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相信，只要把公约的内容真正转化为网络文学作家的立身之矩、创作遵循，一定能够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学发展环境，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让网络文学作者创作出更多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的作品精品，以富有时代感和文学性的作品引领社会审美风尚，更好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即便如此也需要付出认知的努力，至少我们要知道哪里是我们所需。

所以，两位作者认为，我们生活于知识共同体中，“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大量知识储存在他人脑中”，是要让这种处于共处的知识为我所用，其前提条件就是善意向善性。这样我们就不用耗费太多心智去辨识哪些知识是内化了的，哪些根本不在我们脑袋里。

柏拉图在《游绪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中写道：“……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皆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知……我确实比他聪明：我不以所不知为知。”所以我们都可能没有柏拉图聪明。但是正如两位作者在结语中所认为的那样，无知是不可避免的，错觉亦有其价值。因为“从认知的角度讲，之所以会有错觉，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团队的一员，你不必非得经历错觉，但有错觉则表明你确实身处团队之中。”所以我们都是“知识的错觉”的受益者。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美]史蒂文·斯洛曼
[美]菲利普·费恩巴赫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月